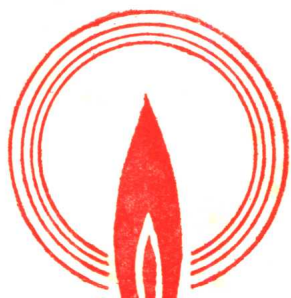


古代学者论治学

傅孙久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古代学者论治学

傅孙久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7·南京

内 容 提 要

我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曾涌现过成千上万卓有成就的学问家。他们在治学道路上经历过艰辛跋涉，积累了丰富的治学经验。他们在这方面的甘苦之言、殷切之谈，是古代治学经验的结晶，也是一份有待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的宝贵文化遗产。

本书力图通过八个方面扼要介绍古代治学论，其中包括——（一）明确学习意义；（二）发扬勤奋精神；（三）重视师友资益；（四）善于质疑问难；（五）强调学以致用；（六）处理博约关系；（七）为学不忘修德；（八）勇于发展创新。

本书可为广大青年努力搞好成才的关键——学习，提供借鉴；同时也可以为学习理论的探索和与此相关的人才学、科学学和教育学等科学研究提供参考。

古代学者论治学

傅孙久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建湖印刷厂印刷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8125 字数：185千

印数：1—3000

ISBN 7-305-00016-7/G·1

统一书号：7336·030 定价：1.40元

前 言

我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曾涌现过成千上万卓有成就的学问家。他们不但为繁荣祖国的科学文化留下丰硕的学术成果，而且在治学的道路上经历了艰辛的跋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在这方面的甘苦之言、殷切之谈，是古代治学经验的结晶，也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认真总结和借鉴。尤其是在今天，四化建设急需人才，学习的问题越来越迫切，与学习密切相关的学科如人才学、科学学、教育学等科学研究方兴未艾，这项工作的开展也就更有必要了。

古代治学论内容丰富、源远流长，它可以一直上溯到春秋以前。从殷墟出土文物得知，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已有学（𠂔）字存在（见刘鹗《铁云藏龟》）。春秋之前，古籍也有关于学习过程和学习方法的若干记载，如“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尚书·咸有一德》）；“学于古训乃有获……惟敦学半，念终始典于学”（见《尚书·说命下》；《说命》虽属伪古文尚书，但古籍如《礼记·学记》等对上文已曾引用，这些论述出现较早还是可信的）。又如《诗经》中的“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诗经·周颂·敬之》）等等。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关于学习的论述还比较简单、零碎，但是从中仍可以看到古人当时已在朴素、自发地积累治学的经验，有些见解甚至一直对后人产生着影响。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古人更加注意总结治学的经验。春

秋战国之际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重要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客观上要求有大量的自然知识和丰富的社会知识。原来“学在官府”，学术文化为极少数奴隶主贵族所垄断的局面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孔丘等首创私学，我国出现了第一代专门学者。随着私学风气的盛行，知识越来越普及，学术文化迅速发展起来。继孔丘创立儒家学说之后，墨翟又开墨家之先河。此后直至战国，道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纷纷倡立新说，《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先后蜚声学林。春秋战国时期在学术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着治学实践的不断深入，这就为深入总结治学经验提供了可能，也大大提高了人们的学习自觉性。这一时期人们在思想上对于学的意义虽然还存在着某些模糊观念，但是在治学的实际过程中，他们已深深体会到只有通过学习才能获得知识。如孔子一再强调他自己是“学知”而非“生知”（见《论语·述而》），因此，为追求知识学问，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同上），把学习作为主动迫切的自觉行为。既然人们对于学习的要求如此迫切，他们也就不可能不讲求学习的实际效果，在潜心学问的同时，必然要认真地摸索学习规律。因为只有掌握学习规律，运用正确方法，才能收到预期的学习效果。因此，这一时期自孔丘开始，治学经验的总结被切实重视起来了。《论语》当中不仅治学论占有很大比重，而且开宗明义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就是有关治学的内容。孔丘而后，墨翟、孟轲、荀况等学者对于治学经验的总结也十分重视，他们的著作里也蕴含着丰富的治学论资料。特别是荀况，他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在治学经验方面对

前人的成果作了系统的总结，撰成我国历史上第一篇系统的治学论专著——《荀子·劝学》。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到，春秋战国时期学者不仅重视总结治学经验，而且对于学的规律性有了初步认识，他们的论述已经广泛涉及目的意义、精神态度、方法途径等学习的基本过程和主要环节。总而言之，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治学实践的深入，促进了治学经验的总结，人们才有可能积累较为系统的治学论资料，人们对于治学的规律性也才可能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当然，治学经验的总结并不是消极被动的，它反过来对于治学实践的深入也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者之所以能够获得各种学术成就，除了其他因素外，这和当时人们重视总结治学经验，认真摸索治学规律不无直接关系。

秦汉以降，古代治学经验的总结又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前进。

自秦至清，我国封建社会经历了从形成发展直至逐渐衰落的长期过程。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推动下，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用辛勤劳动的双手，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同时也培养了成千上万具备各种专长的学问家。这些学问家的积极活动，又把治学实践和治学经验的总结进一步引向深入。

先说治学实践的不断深入。学术成果的获得是人们辛勤治学的结果，因而考察人们治学实践是否深入，也可以从学术成果的丰硕与否来加以衡量。秦汉以来，古人治学实践的不断深入，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说明：其一，知识门类不断增加。春秋战国时期学术畛域不分，学科之间没有明确界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学术文化也在不断向着新的深度和广度开拓自己的领域。适应这种需要，西汉初步萌生目

录学。刘向、刘歆父子开始把当时保存的学术文化著作加以分类。刘向撰《别录》，刘歆继而作《七略》。晋代荀勖的《中经新簿》继郑默的《中经》，又把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隋书·经籍志》最后确定经、史、子、集的名称和次序。到了清代，《四库全书》虽然沿用经、史、子、集四部分法，但从四部底下的具体分类可以看到，古代学术文化发展到当时已经包括天文、地理、医、农、机械、建筑、文、史、哲、音韵训诂、书、画、金石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各种学科领域。其二，记录学术成果的书籍越来越多。秦以前的古籍究竟有多少，因经秦火一焚，难于估计。自东汉班固以后，历代的书籍数量都有约略统计。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书籍仅有“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合一万三千余卷。到了唐初，《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图书已达六千五百二十部，合五万六千八百八十一卷。及至明代，成书于永乐年间的《永乐大典》广收各类图书多达七、八千种。清去明不远，但书籍更加浩繁，《四库全书》收入的图书连同存目多达一万余种。上述各种数字还不包括遗逸以及被抛弃、被禁毁的书籍。因此，知识门类不断增加，记录学术成果的书籍数量逐渐变繁，正好从不同角度说明秦汉以来直至清代，学术文化在不断向前发展，同时也正说明古人的治学实践在不断深入。

自秦至清，古人在深入治学的同时，治学经验的总结也比以前进一步深化。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对前人经验的进一步发挥。比如，荀况的《劝学篇》问世以后，后代学者也有许多类似的治学论专著，诸如西汉贾谊的《劝学》、刘向的《建本》、扬雄的《学行》、东汉王符的《潜学》、东晋葛洪的《勖学》、南北朝刘昼的《崇学》、

颜之推的《勉学》等，都程度不同地对前人的治学经验作了阐述、补充和发挥。其二，突出关键，重点总结。治学是个发展的过程，由许多关键性环节组成。先秦时期的学者虽然对有关环节都已基本接触到了，但对关键性环节的明确认识和重点阐述却有待于后来。比如，关于求师问题，孔子曾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论语·述而》），到了唐代，韩愈的《师说》和柳宗元的《师友箴》，对这一问题的阐述和强调也就更充分了。又如学用结合问题，孔子只谈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而东汉王充的《实知》和《知实》、宋代苏轼的《日喻说》和明清之际王夫之的《尚书引义·说命中二》，对此则说得更加详尽。再如关于博约问题，孔子的“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为提倡博约方法立下首创之功，但是到东晋葛洪的《尚博》，尤其是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博约论，对这一问题的强调和说明更加明确了。其三，结合实际，具体总结。由于学术文化在不断发展，知识门类越分越细，“术业有专攻”的情况越来越明显。因此，根据不同专攻目标，结合治学的具体实际深入总结，也就成为后来总结治学经验的一个重要特点。比如，文有《文赋》（陆机）、《文心雕龙》（刘勰）；史有《史通》（刘知几）、《文史通义》（章学诚）；诗有《诗品》（钟嵘、司空图）、《历代诗话》；书法有《书谱》（孙过庭）、《书断》（张怀瓘）；绘画有《画论》（郭思）、《画史》（米芾）……这些结合学科实际总结的治学经验也就更加深入具体。其四，还有一点应该补充说明的是，继《学记》而后，历代教育家都有许多关于教学经验的总结。《学记》是孔门后学系统总结先秦时期的

教学论专著，对于一千多年的封建教育起着较大的影响。因此，自《学记》而后，关于教学经验的总结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宋明以来，这方面材料更为丰富，如北宋张载的《经学理窟》、辑录南宋朱熹论学言论的《朱子语类》、元代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明代王廷相的《石龙书院学辨》、明清之际王夫之的《四书训义》、清代颜元的《存学编》等书。此外，明清之际黄宗羲编著的《明儒学案》以及黄宗羲未完成又由全祖望等续编的《宋元学案》等学术史专著，也包含有上述的丰富材料。教与学是相互依存的矛盾统一体，学有赖于师的指导和帮助，而教则必须根据学的客观规律来制定具体的方针和步骤；学离不开教，教更离不开学。教学论当中包含着治学论的实际内容，因此，古代教学论的不断总结，实际上也是古代治学论深入总结的一个方面。

总而言之，古代学者关于学的规律性认识是逐步深化的，他们的这些思想和认识，除了以专论的形式出现外，大量的的是通过书信、序、跋，以至各种著述的片段言论等不同形式、不同途径体现出来。所有这些汇集起来，就形成古代治学论的丰富宝藏。

既然古代学者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治学论资料，那么他们对于治学究竟有哪些规律性认识呢？明代学者胡应麟说过：

“学问之途，千歧万轨”（《少宝山房笔丛·华阳博议上》）。诚然，由于学者所处的时代不同，学问的起点不一样；学者的出身、地位不同，所具备的学习条件也不一样；再是知识门类不断增多，个人选择的专攻目标也有所不同，因此古代学者在治学过程中就不可能不根据实际需要，采取适当可行的具体措施。这样，对于治学也就有各种不同的体

会和感受，古代治学论资料的积累也就逐渐形成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如此一来，是不是意味着古代学者的治学没有共同的规律可寻呢？不是的。因为治学归根结蒂属于认识论范畴，不同的学者可以有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客观条件，也可以有不同的专攻目标，但是他们都必须共同遵循一条主观必须符合客观的认识路线。也就是说，不管做什么学问，也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做学问，要想在学业上取得成就，都必须经历从渐次积累直至实现创新的全过程。在这过程中又都必须切实地解决好治学的认识、态度、方法和途径等问题。因此，尽管古代学者各自的治学道路“千歧万轨”，古代治学论材料复杂多样，但是从中仍然可以找到他们治学的一般规律和共通门径，找到他们对于一般治学的规律性认识。他们对于治学的规律性的认识概括起来大致有八个方面（见本书目录）。这些问题虽然强调的侧面不同，但是它们都是治学过程的重要步骤和基本环节；这些问题密切联系起来，贯穿于治学的全过程，应该说就是古代学者治学的共通门径和一般规律。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古代学者关于治学方面的经验总结，不可能完全正确，甚至存在着互相矛盾和精华糟粕杂揉的现象。尽管如此，这仍不失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只要我们认真剔其糟粕，存其精华，它就有可能为四化建设搞好成才的关键——学习，提供有益的借鉴。当然，要做好这项工作是不容易的。笔者不揣孤陋，书中试图通过八个方面来介绍古代治学论，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目 次

前 言	(I)
第一章 明确目的 树立信心	
学以明智	(1)
学以长德	(7)
学贵千金	(13)
天高可问	(20)
圣可勉成	(25)
第二章 业精于勤 学宜发奋	
刻苦发愤	(31)
精勤专一	(37)
持之以恒	(42)
爱日惜阴	(47)
劳逸结合	(54)
第三章 师友资益 为学津梁	
学必有师	(59)
论学取友	(66)
主善为师	(72)
取法务上	(76)
尊师重道	(84)
第四章 学求自得 慎思明辨	
学不废思	(90)
博闻强记	(97)
慎思明辨	(105)

	质疑问难.....	(112)
	学博思远.....	(118)
第五章	学务真知 注重实践	
	未达如吵.....	(123)
	体察知真.....	(129)
	学贵能用.....	(136)
	注重实践.....	(141)
	知行相资.....	(147)
第六章	博而不杂 约而不漏	
	学海可济.....	(153)
	学有宗旨.....	(158)
	切忌孤陋.....	(162)
	博聚约收.....	(169)
	馈贫拯乱.....	(179)
第七章	为人学 相得益彰	
	进德修业.....	(186)
	有益天下.....	(193)
	坚韧不拔.....	(201)
	严肃认真.....	(206)
	谦虚谨慎.....	(213)
第八章	春华秋实 贵在创新	
	守旧无功.....	(220)
	继承发展.....	(225)
	批判前进.....	(231)
	巧运神思.....	(233)
	德识才学.....	(251)

第一章 明确目的 树立信心

为学千头万绪，究竟从何入手？古代学者认为，为学首先必须“知学”，因为“知学，然后能勉；勉，然后日进而不息。”（张载《正蒙·中正篇》）古代学者这一论述，清楚地阐明了“知”、“勉”、“进”三者在为学过程中的关系。所谓“知学”，就是指学者思想上对于学习意义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只有充分明确学习意义，才能自觉产生勉励学习的动力；有了自我勉励的推动力量，学习也才有可能收到不断前进的实际效果。可见，“知”、“勉”、“进”三者密切相关，而“知学”又是其中的首要关键，因此，为学伊始，没有认真解决好认识问题，也就难于积极进取，处处掌握学习的主动权。

那么，应该怎样认识为学的意义呢？古代学者在这方面的论述，概括起来含有两层意思，即强调不但要认识为学的重要性，而且要认识为学的可能性。

学以明智

先说为学的重要性。

我们知道，人们总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有智慧、有才干的人。然而智慧才干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孔子说得好，“欲能则学，欲知则问”（《孔子家语》）。王夫之也指出，“知见之所自生，非固有”（《思问录内篇》）。这说明智慧和

才干既非天上掉下来，也非人脑本身所固有，而是依靠人们后天学习获得的。何以见得呢？

首先，从求知者自身考察，世间根本不存在“生而知之”的人。

《晏子春秋》上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晏婴是春秋时期齐国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大夫梁丘据很佩服他的才华，有一天，终于感慨地对晏子说：“吾至死不及夫子矣！”这种感慨，说明他对晏子为什么能够具备这种才华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心情。听了这话，晏子对他说：“婴非有异于人也，常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而已矣。”晏子说得很恳切，他说他和一般人并没有什么不一样，他的才干是通过深入实际不断学习锻炼的结果。

稍晚于晏婴的孔丘，也是春秋末年享有盛名的学问家。他曾首创私学，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孔子哪来那么多知识传授给他的学生呢？他的学生子贡说得明确：“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意思是说，孔子如果没有认真学习，也就不可能经常作为人们的老师了。事实正是这样，孔子对学习是抓得很紧的。他十五岁就立下学习的志向，并为此而“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孔子自己也表白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可见，象孔子这样的学问家，其渊博的知识也不是天生就有的。

晏婴、孔丘以切身感受否定了“生而知之”的存在，王充和王符等古代学者又进一步用道理和事实论证“生而知之”的荒谬。东汉学者王充明确指出：“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知者”（《论衡·实知》）；“不学自知，不问自

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同上）。他认为人们的知识才干不可能是天生自然的。因为如果是天生自然的话，那为什么“鲧恶禹圣，叟顽舜神”（《论衡·自纪》），“孔墨祖愚，丘翟圣贤”（同上）呢？舜和禹都被人们称为圣神而有才干的人，但他们的祖先却顽钝无能。孔丘和墨翟的前辈都不见得聪明，而孔、墨却成为有学问的圣贤。这岂非咄咄怪事？

东汉学者王符也强调指出：“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潜夫论·赞学》）不管有什么特殊的天资材质，都不可能生下来就有知识，就有才能。为进一步说明问题，他还列举许多具体事例，如“黄帝师风后，颛顼师老彭，帝喾师祝融，尧师务成，舜师纪后，禹师墨如，汤师伊尹，文武师姜尚，周公师庶秀，孔子师老聃”（同上）。黄帝等十一人是当时人们心目中奉为“上圣”的圣人，即使是这些圣人，王符也一一找出他们的师友渊源关系。这说明即使是“上圣”也不可能“生而知之”。当然，上述这些事例有许多出自传说材料，运用这些材料来进行论证，从方法上说是有限性的。但是，古代学者的目的是借此来否定“生而知之”的存在，以证实“学而知之”的重要，这种意图却是十分明确的。

其次，从认识对象考察，人们要对客观事物获得有关知识，就得认真深入学习实际。

战国时学者荀况曾经指出：“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荀子·劝学》）要了解自然界“天高地厚”之壮观，就得亲自登山涉水；要知道学问之博大精深，就得披阅历代文化典籍。先秦时期儒家的教学论专著《礼记·学

记》也指出：“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鲜美的鱼肉，不品尝便不知道它的美味；深切中肯的道理，不学习便不可能知道它的好处在哪里。可见，从宏观到微观，从自然到社会，人们要获得有关知识，都得深入学习。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知物”必须“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王充《论衡·实知》）。对此，明清之际学者王夫之说得更明确：“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张子正蒙·太和篇》）形，指认识器官；神，指思想；物，指认识对象。只有三者密切结合，才能产生知觉，形成认识。应该说，王夫之的观点是符合朴素唯物论的认识路线的。因为所谓知识，说到底乃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它是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产物。离开客观事物，人们就不可能获得对认识对象的有关知识。再以孔子为例。孔子学生樊迟曾经向孔子请教种庄稼和种蔬菜的知识，孔子很坦率地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论语·子路》）。又有一次，卫灵公向他请教用兵布阵的学问，他也实事求是地回答：“军旅之事，未尝学也。”（《论语·卫灵公》）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孔子平时轻视农业生产，未曾与闻军旅之事，尽管他有学问家发达的头脑，种田、打仗的知识也不会自动跑到他脑子里面来。再来看看明代学者王廷相的一段耐人寻味的论述。他说：

物理不见不闻，虽圣哲亦不能索而知之。使婴儿孩提之时，即闭之幽室，不接物焉，长而出之，则日用之物不能辨矣，而况天地之高远，鬼神之幽冥，天下古今之变，杳无端倪，可得而知之乎？

（《雅述·上篇》）

把婴儿“闭之幽室”，让他长期与客观外界隔绝，长大后，必然连日常用品都辨别不了，更不可能知道“天地之高远”、“天下古今之变”的道理了。这些论述形象地说明，要对客观事物获得有关知识，就得深入学习实际，同客观事物直接接触，否则就会象东晋学者葛洪所说的那样，“不学而求知，犹愿鱼而无网焉，心虽勤而无获矣。”（《抱朴子·勤学》）

其三，从为学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考察，知识才干的长进与否同后天学习是否重视密切相关。

西汉刘向的《说苑·建本》有这样一段记载：孔子的学生子路，开始时只是“好长剑”，不爱学习，甚至以“南山劲竹”自况。有一次，他问孔子：“南山的竹坚硬又笔直，砍下来就可以做箭，射出去便能穿皮革，（既然有这样的天资材质），学习又有什么用呢？”孔子针对这种不重视学习的思想，因势利导地反问：“如果把箭末削成羽毛的形状，而箭头又磨得尖尖的，这样不就可以射得更深吗？”子路从中受到深刻的启迪，从此努力学习，终于成为一个有学问有才干的人。子路的进步正是重视后天学习的结果，这种经验是值得记取的。

可是南北朝的江淹，情形就不同了。江淹原是南朝梁的文学家，写过《恨赋》、《别赋》等文学史上有名的作品。《梁书》和《南史》本传上都说他早期学习非常用功，“少孤贫好学，沉静少交游”，“留情于文章”。应该说天道酬勤，是勤奋好学赋予他文学才华。可是到了后来，江淹却渐渐觉得自己才思微退、文泉枯竭，再也写不出象样的东西了。这是什么缘故呢？有人曾编造故事说，江淹因得神人所赠“五色笔”，因此写出异彩纷呈的好文章。后来有一天